

赶超战略的起源：殖民、制度与威权体制

赵秋运¹,李思静¹,魏智武²,杨冀轩¹,李致远¹

(1.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871; 2. 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剑桥 CB3 9EP)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别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说”和“国际价格波动说”。一个经济体的被殖民历史以及独立后的威权体制才是决定赶超战略实施的主要原因,其中威权体制具有决定作用。一方面,公共资源由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提高了赶超战略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的官员激励机制难以确保经济信息的有效传达,这进一步造成了赶超战略的持续。实证研究发现,政治体制的威权程度越高,则该经济体推行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在拥有殖民经历的经济体样本中,该效应更为明显。

关键词:赶超战略;威权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战略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1)05-0009-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这类发展战略以短期内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违背了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学术界对赶超战略的起源已有一些看法,如意识形态说^[1]和国际原材料价格说^[2],本文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赶超战略起源的新机制。本研究不仅补充了学术界对赶超战略起源的研究,同时也给检验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现存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更多地关注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比如,诺斯认为宪政体制下的产权保护是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

的重要原因^[3]。Olson 则以“流寇”和“坐寇”为喻,阐述政治统治如何为私人部门提供激励以实现经济发展^[4]。阿西莫格鲁的“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作用^[5]。但是,由于他们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政府的传统,所以没能有效地解释政府的经济政策。本文补充了上述空白,阐述了经济政策背后的制度逻辑。

一、理论机制

1. 概念界定与识别方法

威权主义是一种介于极权主义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出

收稿日期:2021-07-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JL120)
作者简介:赵秋运(1981—),男,山东济宁人,研究员,从事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专题研究。
通信作者:李思静(1996—),女,北京人,硕士,从事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专题研究。

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威权主义蓬勃发展。在实践界,东亚及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选择采用威权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在理论界,Linz、Guillermo 等对构建威权主义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Linz 定义威权主义的四个基本特征为: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提炼性意识形态但具有特殊心态、缺乏深入政治动员和可预测性且不受限的领导人权力^[6]。在此基础上 Guillermo 以军人官僚权威政体来描述拉美地区的威权主义体制^[7]。21 世纪以来,随着政治多元化加深,更多中国学者关注于威权主义的发展困境与威权政体的转型^[8-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 and 地区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把这种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称为“赶超战略”,其中也包括了“进口替代战略”。对于这种战略,赵玮璇等认为其是后发国家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实现快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10]。林毅夫认为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需要通过扭曲利率、汇率和其他价格,使得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结果使得一国最优产业结构长期扭曲,比较优势得不到发挥^[11]。由此可见,这些战略的目标都是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跟发达国家一样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哪怕这些产业与本国劳动丰裕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相背离。

在政治体制方面,选择 Polity2 数据库中的指数 *polity* 衡量政治集权度,这一指数取值为-10~10 之间的整数,反映了政治体制的三个方特征:决策者受到限制的程度、政治竞争的程度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该变量数值越大的政体被认为越具有民主性质,反之,数值越小则越具有威权性质,集权度较高^[12]。在发展战略方面,用一个经济体的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衡量其政府发展战略的赶超程度,*TCI*

实际上反映了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偏离程度^[13-14]。图 1 展示了可获得相应数据的经济体的指标。由图 1 可见,采用赶超战略(表现为 *TCI* 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国家的 *polity* 指数又相对较低,体现出威权特征与赶超战略的空间相关性。其中,这一阶段的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由于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特征,可能拥有较高的 *polity* 指数,但由于其军政府属性,实际上也应被界定为威权政体。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威权主义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概念,且通常带价值判断,但本文基于所选取指标的含义,将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角度客观理解这一概念。政治集权度所反映的是执政集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掌控社会资源,这种控制意味着执政者具有更充分的禀赋去推行政策,也就是拥有更大的政策选择集。

2. 典型事实与理论机制

在赶超战略盛行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本文分别选取阿根廷、尼日利亚及印度为代表国家进行案例分析。

阿根廷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成立军政府,建立起军人官僚威权政体。该时期的阿根廷政府实施高度干预的措施,长期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阿根廷的进口替代战略的特点是内向发展,逐步建立起替代进口品的本国工业。最终,这种赶超战略的实施扭曲了阿根廷国内的产业结构,政府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矿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预算软约束,进一步导致了日渐高企的政府债务,也导致了更多的寻租空间。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继承之前殖民地时期的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建立起威权政体,经济上采取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赶超战略,对利率、汇率、价格实施管控,同时实施税收保护政策,促进本国工业发展。1967 年尼日利亚爆发内战,成立军政府,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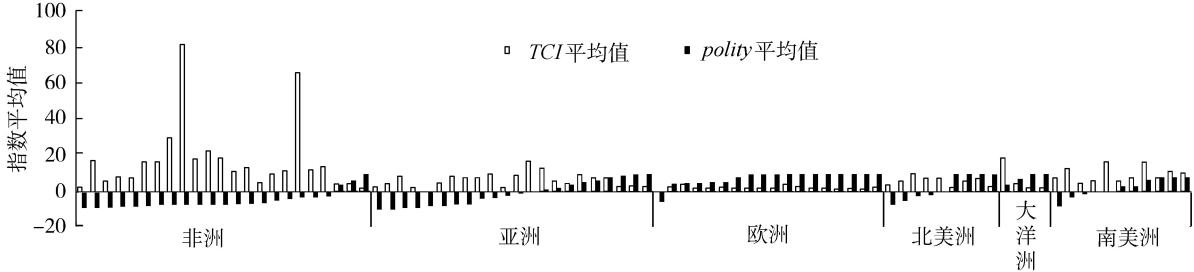


图 1 各大洲经济体 1970—1990 年技术选择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平均值

内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继续推行赶超战略,使得其国内产业结构扭曲。大量通过石油出口获取的外汇储备,通过各种预算软约束补贴给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其国民经济出现下滑。

印度在 1947 年独立后,尼赫鲁担任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层面建立起威权政体,在经济层面学习苏联模式,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通过关税和进口许可证等措施实行进口限制;通过各种预算软约束来扶持国内企业,使得国内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发展速度较快,其他工业部门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受到约束。

那么,赶超战略为何出现?有一些学者认为,受出口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和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所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2],上述说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全面。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一国采取赶超战略与否的关键因素^[1],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界定“意识形态”的概念。本文认为威权体制才是影响一国采取赶超战略的主要原因,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威权政体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其领导者能够高效调动大量公共资源,而不像民主政体那样需要通过复杂的程序实现。一般而言,威权政体的政治领域带有一定的封闭性,重要的公共事务往往是由少数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控制^[15]。这样的政治结构常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大多是在一些政治领袖的带领下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政治领袖因而能对国家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作为新生国家的第一代领导者,政治领袖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他们渴望国家尽快摆脱落后现状,像发达国家一样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样的愿望使得他们更容易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对地,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民主政体中不容易产生,因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意味着农业必须补贴工业,而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远大于从事工业的人口数量,所以即使他们也有民族自强意愿,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也难以承受不平衡发展的代价。如果他们能参与决策,赶超战略是难以通过的。

另一方面,威权政体始终面临信息传达失真的问题,这将导致赶超战略的持续。赶超战略会导致经济体中严重的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由于在威权政体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任

命,而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所以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往往是来自于上级的肯定而非民众的认同。在赶超战略下,只有那些地方重工业发展成绩突出的官员才会获得嘉奖和职位上的晋升,而上级政府又缺乏充分获取真实经济信息的手段^[16],于是地方官员就会有瞒报真实经济指标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倾向,导致赶超战略难以被纠正、反而被加强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赶超战略的实施可能强化威权体制,且赶超的愿望可能来自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赶超战略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其出现首先依赖一个具体的政府乃至具体的决策者的存在,而非某种抽象的“集体意识”。因此,尽管双向因果关系可能存在,但政治体制对发展战略的影响是主要的。

二、模型与数据

1. 基本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一国的政治制度与赶超战略选择之间的联系,估计方程如下:

$$TCI_{i,t} = \beta Polity_{i,t-1} + X_{i,t-1} \Gamma + \alph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TCI_{i,t}$ 为*i*国*t*年的 TCI ; $Polity_{i,t-1}$ 为*i*国*t*-1年的 $Polity$; β 为 $Polity$ 的回归系数; X 为一组描述国家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实际 GDP(对数形式)、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等; Γ 为 X 的回归系数; α_i 为国家固定效应; γ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矫正干扰项。 t 的范围涵盖 1970—1990 年,之所以选择该阶段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数据可得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众多新生国家在这段时间开始建设国家经济工业体系。式(1)中的技术选择指数 TCI 为因变量,正如本文第二部分的介绍,一国采取的赶超战略越激进,则其 TCI 值就会越高。 $Polity$ 是度量政治体制的核心解释变量,该值越大表示一个国家的体制越民主。

上述模型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 α_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γ_t :国家固定效应可以吸收任何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例如国家之间持续的文化差异、殖民地属性差异、地理位置差异、独立时间差异等;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影响所有国家的全球趋势。所有的标准误聚集于大洲×年份层面,以矫正干扰项 $\varepsilon_{i,t}$ 在同一个大洲、同一个年份的自相关性。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对解释变量均采取了滞后一期处理,另外也采取了多期滞后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为避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

也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目的在于控制一系列不随时间变化和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排除了比如意识形态^[1]、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17-18]、被殖民时间的长短^[19-20]等因素对政府所选择的发展战略的影响。对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如前所述,一个国家如果权力越集中,基于建国初期快速建立国防工业体系的良好意愿,其越有可能采取赶超战略,因此预期 β 估计值显著为负。

2.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为宾大世界表、殖民历史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等。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数据集包含了105个经济体在1970—1990年的数据^①。在计算TCI时,关于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劳动力参与人数、实际GDP(需求侧)的数据来源于宾大世界表^②,而人口总量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为了统计口径一致,本文使用了该变量的即期本国价格形式^[21]。与陈斌开等^[21]以及林毅夫^[2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文剔除了TCI大于20和小于0.05的离群样本。*Polity*来自*Polity2*数据库,如第二部分所述,本文以这一指标的正负性界定民主与威权体制,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减去均值,再除以标准差)使其更具连续型变量特征。人均实际GDP(对数形式)、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指数根据宾大世界表和世界银行WDI中的变量计算。本文从ICOW殖民历史数据集获得了有关殖民地特征的变量,运用两种方式对被殖民年数进行测量,分别是加总被殖民年数和被占领年数;另外,以加总被占领年数和成为被保护国年数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③:第一,在全部样本中,TCI的平均值为6.42,小于威权体制样本的平均值(9.24),大于民主体制样本的平均值(4.90)。第二,威权体制下的TCI均值要显著大于民主体制, t 检验的 p 值小于0.01,这为威权体制与赶超战略的相关性提供了初步证据。第三,在人均实际GDP对数 $\log(gdp_per)$ 、人均资本对数 $\log(cap_per)$ 、人力资本指数 $human_cap$ 方面,威权体制都要显著小于民主体制,这说明威权体制主要出现在欠发达经济体。第三,现存一系列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气候条件和与赤道之间的距离有关^[23-26],本研究考虑了这类因素,通过固定效应控制了各个国家首都的纬度,数据显示威权体制的平均纬度相对民主体制较低。第四,威权体制国家多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

严重的国家,有较强的建设国防工业体系愿望,此类国家在二战中的平均死亡率为3.59%,高于民主体制国家的1.44%。第五,从本文的样本来看,被法国和荷兰殖民统治过的国家中,采取威权体制的比例要高于民主体制,而被西班牙或葡萄牙、英国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则相反。

图2、图3和图4进一步考察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图2绘制了全部样本、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的TCI累积密度函数图,表明威权政体的TCI值要系统地高于民主政体。图3把样本划分为殖民地和 non 殖民地^④,并绘制了相应的TCI累积密度图,可见殖民地的TCI值系统地略大于非殖民地。图4展示了TCI、人均实际GDP对数、人均资本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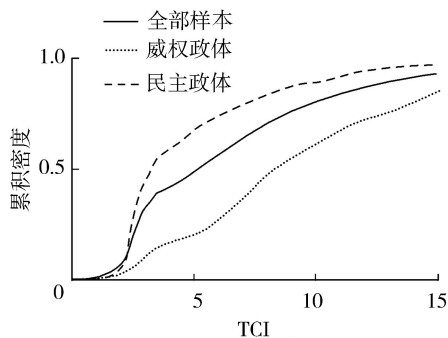


图2 分政体类型的TCI累积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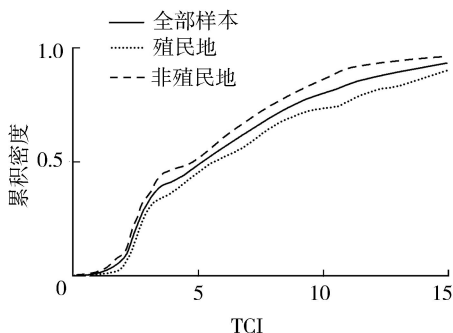


图3 分殖民经历的TCI累积密度

①其中,45个经济体在所有年份都有观测值,6个经济体仅有1990年的观测值,3个经济体拥有1986—1990年的观测值,2个经济体拥有1984—1990年的观测值,2个经济体拥有1977—1990年的观测值,剩下的经济体为其他分布模式。

②价格因素已被考虑在内并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因此TCI指数已排除价格、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③因为篇幅所限,本文删除了统计性描述表,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④本文把被法国、荷兰、西班牙或葡萄牙、英国殖民统治过的经济体称为殖民地,其他则为非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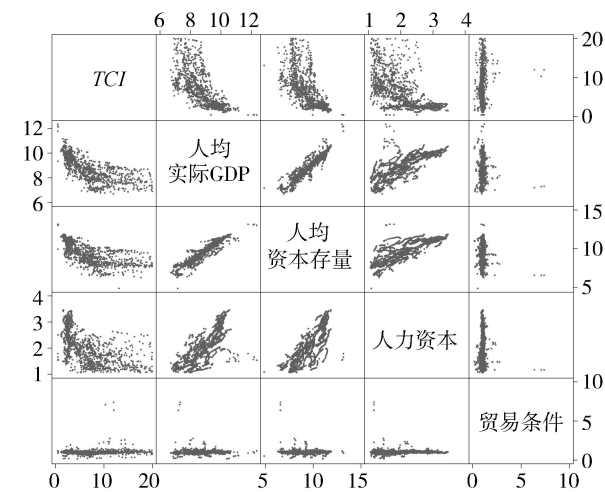


图4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矩阵

对数、人力资本指数和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性矩阵,很显然,*TCI* 与人均实际 GDP 对数、人均资本存量对数和人力资本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经济体往往 *TCI* 值较大,采取赶超战略的可能性更大。林毅夫认为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是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主要原因^[2],然而本文并没有发现贸易条件与 *TCI* 之间存在相关性。尽管如此,要考察上述变量与 *TCI* 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框架,第

表1 基准回归:政治体制与赶超战略(被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 *TCI*)

解释变量	OLS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5)	(6)
<i>sd_polity</i>	-2.175 *** [0.183]	-0.484 *** [0.172]	-0.471 *** [0.168]	-0.488 *** [0.164]	-0.530 *** [0.164]	-0.531 *** [0.162]
$\log(gdp_per)$			-1.363 *** [0.296]	-1.458 *** [0.277]	-1.984 *** [0.336]	-1.969 *** [0.330]
<i>trade_term</i>				0.255 [0.278]	0.338 [0.275]	0.295 [0.282]
$\log(cap_per)$					-0.940 ** [0.423]	-0.831 * [0.430]
<i>human_cap</i>						2.337 [1.430]
常数项	6.413 *** [0.185]	3.570 *** [0.497]	14.232 *** [2.387]	14.668 *** [2.270]	10.243 *** [3.235]	6.352 * [3.383]
国家固定效应	×	√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样本量	1093	1093	1059	1059	1059	1056
R^2	0.246	0.908	0.911	0.911	0.912	0.912

注:*sd_polity* 为标准化政治体制变量, $\log(gdp_per)$ 为对数化人均实际 GDP,*trade_term* 为贸易条件, $\log(cap_per)$ 为对数化人均资本,*human_cap* 为人力资本指数,具体信息可参见第二部分的数据介绍。显著性水平 * $p < 10\%$, ** $p < 5\%$, *** $p < 1\%$ 。“×”为回归模型中未添加对应项;“√”为回归模型中的添加了对应项。下同。

三部分将报告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

三、实证结果

本部分对政治体制与赶超战略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经济体不同的殖民经历考察了效应的异质性。首先报告基准回归结果,即政治体制对赶超战略的效应。由于制度具有延续性^[26],殖民地在独立以后往往会继承其宗主国遗留下来的制度体系,所以殖民经历不仅会作用于经济体被殖民时的经济表现,还会对其独立以后的发展带来影响,本部分的第二小节将对此进行讨论。

1. 基准回归

表1 报告了政治体制影响赶超战略选择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为 OLS 方法,回归结果表明政治体制对技术选择指数 (*TCI*) 的效应显著为负,也即越民主的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低,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然而,OLS 回归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所以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见第(2)~(6)列的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自变量 *sd_polity* 的系数全部都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且回归模型的 R^2 都在 0.9 以上,这表明本文的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赶超战略的起源,*TCI* 超过 90% 的差

异可由模型中的变量进行解释。根据第(6)列的回归结果,政治体制变量 *polity* 每增加 1 个标准差,*TCI* 将下降 0.531,这一变化占 *TCI* 标准差的 11.8%。

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实际 GDP(对数)、人均资本(对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产业结构扭曲的程度越小。然而,本文没有发现人力资本指数具有显著效应,这可能是源于其效应已经被前面的两个控制变量所吸收。此外,在第(4)列和第(5)列中,*trade_term* 前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本文的回归结果排除了“原材料国际价格波动”假说,即贸易条件的变化并不影响经济体对赶超战略的选择。

2. 政治体制、殖民经历与赶超战略

表 2 报告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研究体制类型与殖民历史对一个国家政治集权度和赶超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第(1)列复制了表 1 中第(6)列的全样本估计结果以供对照。第(2)和(3)列分别在民主政体(*polity* ≥ 0)和威权政体(*polity* < 0)中考察政治集权度对 *TCI* 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polity* 对 *TCI* 的影响均显著为负,然而它们的效应并不相等,根据 *sd_polity* 系数的绝对值,民主政体政治体制变量对技术选择指数的影响小于威权政体。这是合理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威权政体的制度约束较弱,贯彻中央决策、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能力更强,所以威权政体的政治集权度越高,就越有能力实施赶超战略。相反,民主政体由于权力存在多方牵制,制定和执行决策往往需要较长的程序,即使政治集权度增加,其调动

资源的效率也相对较低,因而 *TCI* 受到的影响就会相对较小。

第(4)和第(5)列报告了拥有被殖民历史和没有被殖民历史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历史上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常常会继承其宗主国遗留下来的制度,这些国家除了少数采取“包容性制度”,其他很多国家继承了“攫取性制度”并形成了后来的威权体制^①。另外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这些前殖民地国家涌现出了一批与殖民者进行顽强斗争的政治领袖,而且这些政治领袖通常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和激昂的民族意识,在赶超思潮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就更容易将资源集中配置于重工业。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拥有被殖民历史的样本中,政治体制对 *TCI* 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无殖民历史的样本中,效应则不显著。这进一步为殖民经历对国家经济表现具有长期影响补充了证据——由于 *TCI* 越高,产业结构会更加扭曲^[10],扭曲的产业结构会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殖民经历不仅使彼时的国民遭受苦难,长期来看还会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另外,本文绘制了 *TCI* 与殖民历史时长的散点图和拟合线^②。图 5 使用的是第一种殖民历史的测量,即加总被殖民年数和被占领年数,图 6 使用加总了被占领年数和成为被保护国年数的殖民历史变量。根据图 5 和图 6,可以发现殖民历史的时长与 *TCI* 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殖民历史时间越长,产业结构扭曲的程度越高,其采取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大。国家被殖

表 2 异质性分析(被解释变量:技术选择指数 *TCI*)

解释变量	(1) 全部经济体	(2) 民主政体	(3) 威权政体	(4) 拥有被殖民历史	(5) 无被殖民历史
<i>sd_polity</i>	-0.531 *** [0.162]	-0.307 ** [0.151]	-1.452 *** [0.415]	-1.878 *** [0.340]	0.071 [0.127]
log(<i>gdp_per</i>)	-1.969 *** [0.330]	-1.759 *** [0.457]	-1.278 ** [0.600]	-1.745 *** [0.327]	-0.832 [1.125]
<i>trade_term</i>	0.295 [0.282]	0.055 [0.351]	-0.045 [0.698]	-0.096 [0.502]	0.247 [0.187]
log(<i>cap_per</i>)	0.831 * [0.430]	0.778 ** [0.305]	1.102 [0.767]	1.017 ** [0.452]	0.747 [0.955]
<i>human_cap</i>	2.337 [1.430]	-2.553 ** [1.089]	5.794 * [3.146]	2.100 [1.737]	2.101 [2.714]
常数项	6.352 * [3.383]	15.313 *** [2.980]	-12.294 [8.504]	4.577 [4.598]	0.014 [9.355]
国家固定效应	√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样本量	1056	658	398	551	505
<i>R</i> ²	0.912	0.960	0.866	0.926	0.889

注:显著性水平与变量含义同上。把 *polity* 小于等于 0 的经济体定义为威权体制国家,把大于 0 的经济体定义为民主主体制国家;把被法国、荷兰、西班牙或葡萄牙、英国殖民统治过的经济体称为拥有被殖民历史的经济体,其他则为无被殖民历史的经济体。

①有关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论述,请查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 罗宾逊所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②在整理不同经济体殖民历史时,为了专注研究被殖民的经济体的被殖民时长与 *TCI* 的关系,本文删去了没有被殖民经济体的样本数据。

民的时间越长,在殖民历史中受到的经济、政治等压迫越大,就越会通过赶超战略来实现强国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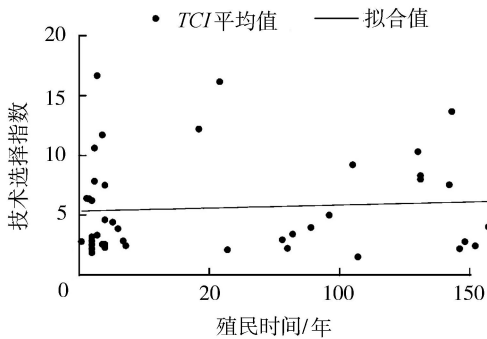


图5 TCI与殖民历史散点图(衡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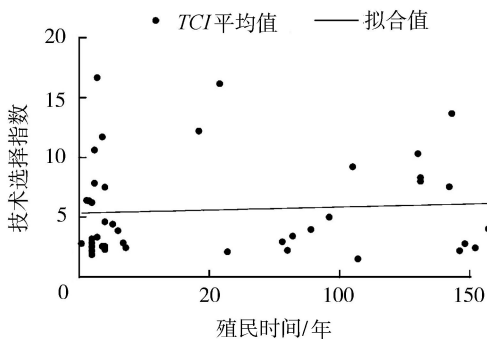


图6 TCI与殖民历史散点图(衡量二)

3. 稳健性检验

表3对赶超战略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上述回归中,赶超战略的衡量指标TCI是一个连续型变量,考虑到本文所探究问题是经济体是否选择了赶超战略,因此进一步将TCI大于平均值1个标准差的经济体识别为采取赶超战略的经

济体(虚拟变量取值为1),然后进行回归。第(1)列sd_polity前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说明威权政体实施赶超战略的可能性更大,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第(2)列不对政治体制变量作标准化处理,即直接使用polity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仍然保持显著为负。由于一定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经济运转情况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本文在第(3)列中使用标准化政治体制变量的滞后两期项代替滞后一期项再进行回归,如结果所示,sd_polity_2前的回归系数与-0.531相比,不仅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大小也相近,这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此外,本文还使用了不同的标准误估计方法,将其聚类于国家层面,也即假设残差项在同一国家不同年份之间存在自相关,第(4)列报告了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符合本文的预期,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同时,本文分样本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回归,sd_polity系数为-1.079,在绝对值意义上大于-0.53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加强了本文的结论;即使同为亚非拉国家,其中一些国家采取赶超战略,主要是由于拥有集权度较高的政治体制。

四、结 语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施赶超战略,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产业结构扭曲等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结果。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主要的

表3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1) 被解释变量TCI为虚拟变量	(2) 政治体制变量未经标准化	(3) 核心自变量滞后两期	(4) 标准误聚类于国家层面	(5) 样本只包含亚非拉国家
sd_polity	-0.038 * [0.021]			-0.518 * [0.300]	-1.079 *** [0.226]
polity		-0.069 *** [0.021]			
sd_polity_2			-0.482 *** [0.174]		
log (gdp_per)	0.063 [0.056]	-1.969 *** [0.330]	-1.481 *** [0.419]	-1.893 ** [0.909]	-1.988 *** [0.353]
trade_term	-0.020 [0.029]	0.295 [0.282]	0.222 [0.516]	0.223 [0.353]	0.374 [0.304]
log (cap_per)	-0.052 [0.053]	0.831 * [0.430]	0.703 [0.514]	0.682 [0.839]	0.665 [0.547]
human_cap	0.192 [0.181]	2.337 [1.430]	1.504 [1.420]	2.118 [3.029]	3.564 ** [1.621]
常数项	-0.434 [0.532]	6.529 * [3.373]	4.790 [4.022]	7.655 [6.692]	10.875 * [5.919]
国家固定效应	√	√	√	√	√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样本量	1056	1056	969	1096	593
R ²	0.778	0.912	0.917	0.914	0.877

注:显著性水平同上,除第(4)列外,聚类于大洲×年份层面。polity是未经标准化的政治体制的衡量,sd_polity_2是滞后两期的已标准化的政治体制变量。

解释:一是“意识形态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具有赶超意愿;二是“原材料国际价格波动说”,认为原材料的价格下降是主要原因。本文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新解释,即威权体制才是20世纪社会思潮下发展中国家采取赶超战略的主要原因。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威权程度越高的国家,采取赶超战略的可能性越大。具体而言,政治体制变量 *polity* 每减少1个标准差, *TCI* 将上升0.531。本文还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具有比较强烈的赶超意愿,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威权程度越高,采取赶超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本文的计量模型控制了一系列随时间变化和不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

一个经济体能够采取赶超战略,意味着其政府能够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因此,威权政体虽然在历史上实施赶超战略、未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有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导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威权政体反而能扬长避短,如威权体制下经济腾飞的新加坡。因此,本文倡导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除了关注产权保护以外,也应该关注“有为政府”,唯有如此,才能加深对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制度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章奇,刘明兴. 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J]. 经济学(季刊),2005,5(1):335-358.

[2] 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道格拉斯·C. 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 厉以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 OLSON M.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3): 567-576.

[5]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6] LINZ J J.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D]//Erik A, Stein R. Mass Pol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7] GUILLERMO D.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C] // DAVID C.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8] 孙代尧. 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J].

文史哲,2003(5):144-150.

[9] 许瑶. 威权主义:概念、发展与困境[J]. 国外理论动态, 2013(12):83-91.

[10] 赵玮璇,程志强,魏智武,等. 赶超战略与产业结构扭曲——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2020,36(6):42-57.

[11] 林毅夫.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 经济学(季刊),2002,2(1):269-300.

[12] EPSTEIN D L, BATES R, GOLDSTONE J, et al. Democratic transi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6, 50(3): 551-569.

[13] LIN Yifu, LIU Mingx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in lagging regions[R]// Annual World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4: 197-223.

[14] 陈斌开,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2013(4):81-102.

[15] 包刚升. 政治学通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6]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7] SACHE J D. 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M]. New York: NBER Working Papers, 2001.

[18] BARRO R J, RACGEK M.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 New York: NBER Working Papers, 2003.

[19] CHAI Sunki. Endogenous ideolog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in former colon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8, 46(2): 263-290.

[20] PORTA L, LOPEZ-DE-SILANES R, SHLEIFER A, et al. Law and fina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1113-1155.

[21] 陈斌开,伏霖. 发展战略与经济停滞[J]. 世界经济, 2018, 41(1): 52-77.

[22] 林毅夫.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3] DIAMOND J M.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7.

[24] GALLUP J L, SACHS J D, MELLINGER A D.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9, 22(2): 179-232.

[25] HALL R E, JONES C.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83-116.

[26] ACEMOGLU D, SIMON J,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369-1401.

(责任编辑:张志琴)